# 第一章　战前的云南

## 一、初具抗战基础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帷幕。当时，云南正处于相对稳定时期，云南各民族人民历经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之苦，正在为医治内战的创伤，发展生产，建设家园而辛勤劳动，云南呈现一派和平发展的景象。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燃起的侵略战火，把中华民族和云南各族人民投入了图生存、求解放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

云南是发动护国起义、再造共和民国的故乡。但它和全国各省一样，历经了民国早期（1917～1927年）的军阀混战，社会经济遭受摧残，人民生活非常困苦。1927年（民国16年），中国民主革命掀起了新的高潮，打倒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大革命战争，由南向北推进到中国中部各省。在革命大潮中，云南政局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2月6日，昆明镇守使龙云（原第五军军长）、蒙自镇守使胡若愚（原第二军军长）、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原第十军军长）、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四位镇守使发动政变，推翻了唐继尧在云南的军阀统治，由龙云、胡若愚、张汝骥等人联合执政，这就是云南历史上的“二六政变”。6月14日，胡若愚、张汝骥又发动突然袭击，一举俘获了龙云、并驱逐了在昆明的龙云所部军队（史称“六·一四政变”）。但时隔不久，龙云的部属卢汉等人又率龙云所部军队发动反攻，胡若愚、张汝骥的军队在战争中失利，胡、张势力被逐出昆明。胡若愚被迫和被他囚禁中

的龙云于 8 月 13 日达成协议，由龙云主持云南政权，胡、张“自愿”率军出省参加北伐。但胡、张并不甘心失败，接着就爆发了龙、胡、张在云南的三年混战，直至 1929 年末，龙云在战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胡、张的军队被龙云消灭，龙云一派牢牢地控制了云南的军政权力，奠定了龙云对云南长达 18 年（1927～1945 年）之久的统治基础。

龙云控制云南政权之初，正是蒋介石夺取全国军政权力，并通过新军阀混战，消灭各省地方军事实力派而巩固其南京政权的时期。龙云为巩固其对云南的统治，他必须得到蒋介石南京政权的认可和支持。于是，龙云竭力攀附蒋介石，在云南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摧残中共地下组织。1928 年 1 月，蒋介石南京政权正式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云南卷入长时间的军阀混战，尤其是三年的省内战乱，使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众怨鼎沸；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社会金融混乱；军队在战争中急剧膨胀，臃肿庞杂，既无战斗力，政府又无力供养。云南社会经济的客观状况，表明龙云政权统治基础十分脆弱。龙云政权要有足够的力量防御蒋介石的武力兼并和对付省内的反对势力，就必须巩固和加强他的政权基础。同时，又鉴于日本的侵华战争行动步步逼近，我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因此，有必要为反侵略战争做准备。为此，从 30 年代开始，龙云把主要力量用于整顿云南内部，即整理财政、发展贸易、恢复生产，同时整顿军队、改善装备、积蓄力量，以稳定和巩固其政权在云南的统治。并奠定初步的抗战基础。于是，龙云政府在 1931～1936 年期间，从财政、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与改革。

首先，龙云政府整顿了极为混乱的财政税收体制。龙云指派当时云南第二号实力人物卢汉，以第九十八师师长兼任财政厅长，下令收回军人把持的各项税收大权；将名目繁多的 64 种税

目加以归类，简化为 7 项税种，并采取招商承包，实行“财政商业化”，1931 年又开征特种消费税等等，从而革新了税收制度。这些措施，使财政税收大幅度增加，财政收支由入不敷出，转为逐渐有了结余。据记载，1927 年收入旧滇币 570 多万元，支出 1800 多万元，1929 年 8 月，省政府积欠富滇银行旧滇币 4162 万元；又据省财政厅《财政月报》公布，至 1936 年，云南岁入总额达新滇币 2800 余万元，岁出为 2300 万元,岁余约 500 余万元。① 省政府不仅改变了财政极端拮据、入不敷出的窘困局面，而且有了大量的财政结余，用以加强云南军备。在 1931 至 1936 年间，龙云政府曾先后支出 5000 多万元，购进欧洲生产的大批精良的武器装备。在此期间，龙云政府支持工矿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扶持个旧锡业公司生产、又组建钨锑公司等，发展出口商品生产（主要是锡、钨砂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省政府下属的企业和公司已达 39 个。1932 年，省政府将富滇银行改组为“富滇新银行”,任命缪云台为行长,并整顿了以富滇新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统，形成了云南省的银行和银号体系；由富滇新银行独占货币发行权和控制外汇收入，使龙云等人通过富滇新银行迅速扩大了资本实力。据统计，富行在 1933 年时吸收的存款仅 100 余万元（新滇币），至 1935 年即增至 4800 余万元。在农业及粮食生产方面，龙云政府鼓励农民积极生产，又鉴于云南粮食历来不能自给的情况,规定各县及乡镇一律建立“积谷制度”,即在征收田赋（公粮）粮食的同时，由交粮户提交一定数量的储备粮食,积存在县乡各级粮库,称为“积谷”。为准备急时之需和预防粮荒，到 1937 年抗战爆发前，云南全省的积谷总数已达 286.6737 万石。这一数量巨大的积谷，为后来大量军队入滇抗战充作军粮，发挥了重大作用。

①当时旧滇币与新滇币的比值为 5∶1。

第二，龙云着重整顿了云南军队。军队是龙云政权赖以生存的支柱，但在连年战争中急剧膨胀起来的滇军，已经非常臃肿并缺乏战斗力，而且在极端拮据的财政面前，也无力供养这支庞大的军队。在 1930 年的蒋桂战争中，龙云奉蒋介石之命，出动 3 个师 15 个团约 2 万人，由卢汉率领进攻广西南宁，结果失败而还。龙云乘机命卢汉东归途中，于广西罗里对滇军进行了大整编，将 15 个团缩编为 6 个团，2 万余人的兵员约减少了一半。这支滇军回到云南后，龙云又提出“废师改旅”的进一步整军方案，遭到师长们的反对。1931 年 3 月 10 日，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四师长发动了一次未遂政变。龙云乘平定四师长政变之机，断然免去了四师长的军职，并撤消了各师的建制。将原第九十八师改为第三旅，任命龙雨苍为旅长；第九十九师改为第五旅，任命鲁道源为旅长；第一百师改为第七旅，任命龚顺璧为旅长；第一百零一师改为第九旅，张冲降为旅长。张凤春仍反对改编，被关进了军人监狱。同年 5 月，滇军第三旅第六团又发动了一次倒龙军事政变，被龙云迅速平定。龙云巧妙地利用平定两次军事政变之机，对滇军进行了整顿和改编，缩小了编制，强化了军队组织。

接着，龙云对滇军各级军官进行了整顿。一方面对原有军官进行裁汰，规定团、营以上军官一律由龙云直接裁定，使留任的军官都绝对服从他的指挥，对他忠勇可靠；另方面，建立一系列的军官培训机构，大批培训忠于龙云的新的军官。早在 1928 年即成立了军官团，1929 年成立了军官候补生队。后来出任滇军的师、团长的陇耀、瞿琢、保如光、张秉昌、李佐、桂协华、王士高等人都是这时培训的。 1930 年成立军官教导团，由龙云任团长，对选拔出的合格人员进行军事和政治培训；教导团还设经理班，专门培训军需人员，使军队的军需独立，指挥官不得管经费。军官训练团，开办了三期，共培训军官 4000 多人。1935年

在昆明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 5分校，继续培养滇军军官。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第 19 期之后，由龙云主管，也成为龙云培养忠于他的军官的基地。同时，龙云还经常抽调一些忠于他的军官到陆军大学和中央各军事专科学校培训，毕业后回滇军中任职。

龙云整顿云南军队的组织编制，精简了机构，强化了军事组织，同时培训大量的忠于自己的军官。这样就使龙云时期的滇军成了一支素质较高的军队，龙云就是依靠这支军队作为统治云南的支柱，增强了龙云政权的基础。

龙云政府财政收入增多，外汇储备增加。购进了法国、捷克、比利时等国制造的可装备 40 个步兵团的武器装备，约合 2800 万元港币。到 1936 年时，滇军共编成了 6个步兵旅，每旅 2个步兵团，每团 9个步兵连，另建 3个重机枪连，1 个迫击炮连，1 个高射机枪连。其武器装备为：每个步兵连配备“七九步枪”60 支、轻机枪 6挺；每个重机枪连配重机枪 4挺；炮兵连配“八二迫击炮”2 门；“六〇炮”2 门；高机连配“13.2 厘米高射机枪 2挺。另外还有 2 个直属大队，6 个直属团，4 个独立营，1 个航空处，当时滇军共有兵员 3.6 万人。在各县还组建了常备队，编成 21 个保安营，约有 1 万余人，作为滇军的候补队伍。

30 年代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云南拥有的这支训练有素，装备比较精良的滇军队伍，就成为了抗战爆发时，云南能迅速组成中国陆军第六十军，并在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中立下战功，并在江西前线和滇越边境前线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的基础。这支军队为云南人民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谱写了光辉篇章。

第三，龙云政府还加强县级政权建设、各县的常备兵训练及学校教育事业，以及公路交通建设等各项事业。龙云重视县级政权的建设，把它作为巩固和加强全省政权的基础，对县长人选十分重视并亲自任免，还于 1935 年开办了县长训练班，通过专门

考试录取进行培训，取得县长任职资格后分别委用。龙云政府为加强管理，重新调整了行政区划，把全省划为 1个市（昆明）、112个县、15个设治局（设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土司区的、预备设县的县级行政机构）和 2个对汛督办区，对腾冲、龙陵边区和思茅、普洱边区，特设了 2个殖边督办公署。还在全省清查了户口和人口。据 1932 年调查统计，全省有 133万户，1179万余人。省政府在严密划定县、区、乡行政区划之后，按区、乡编为保甲团防，在保甲组织的基础上编练常备兵。按县的大小，将各县编为甲、乙、丙、丁四种常备队，甲种队兵额 150名，乙种队100名，丙种队 80名，丁种队 40名。常备兵兵源按陆军征兵制度，抽调 20至 24岁的青年壮丁入队轮训，每期受训 6个月。为了督练团防常备兵，设立了全省团务督练处。划省城昆明附近的13县为直属区，全省其他各县划分为 10个区，每区设一个团练分处，由省政府选派陆军中下级军官作为各常备队军官，负责训练各地常备兵。据统计，到 1935 年，累计全省共训练常备兵员4万余人，成为云南陆军的一支强大的后备队伍。

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一直是比较落后的，龙云当政后较其他事业而言对教育事业也重视不够。但 1928年底，龙云政府把云南的卷烟特捐（烟草税）划作教育的专项经费，使教育经费独立。教育厅接管时收入旧滇币 36万元（约合国币 3万多元），经几年的经营和整顿，至 1935 年时，此项教育专款收入达国币 96万元，使教育事业得以维持并有一定发展。到 1941 年抗战吃紧，经费紧张之际，此项教育专款又被取消了。

因鉴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和战争的临近，龙云政府对于公路交通建设非常重视。 1931 年后，成立了全省公路总局，龙云以省主席兼任公路总局督办，命各县设立公路分局，制定了宏大的公路建设计划，拟修建滇东、滇东北、滇西、蒙（自）剥（隘）四大干线。滇东、滇东北两线是通往贵州、四川，连结祖

国内地的重要干道；滇西线是计划贯通滇西的大道，至抗战前夕，已修至大理、下关，抗战爆发后，成了抢修完成的“滇缅公路”的东段，后来成为抗战中通过缅甸连接海外的大西南最重要的国际交通干道。云南政府战前计划建设的公路干线总长约6000余公里，这是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在战前进行的一系列整顿和革新中，较为显著而卓有成效的一个方面。

龙云当政的云南省政府，在抗战爆发前的30年代前期，对云南的经济、军事、政治以及文教、交通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使得云南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得到了恢复，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军队素质有了提高，战斗力得到了加强。这不仅使龙云在云南的统治得以稳定，而且使云南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能够迅速出动20万以上的大军奔赴前方抗战。并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物质基础，应该说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 二、救亡运动高涨

云南各民族人民具有光荣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传统，经过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的锻炼，云南人民一直保持高昂的革命斗争精神，注视着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动向。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集团对入侵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迅速侵占了东北三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和反对，云南各族人民激于爱国主义热情，纷纷要求抗日。昆明人民的行动最快，各中、小学校学生迅速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商人罢市、各报刊纷纷发表抗日报道和评论。9月28日，昆明全城‘闭市一天,志哀国耻”。各中、小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全省民众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对日经济封锁！一致誓死抗日！全省民众武装起来，对日宣战！……声

震天地，不绝于耳”。10月3日，在云南军官教导团大操场召开了反日民众大会，会后游行示威，这是“昆明前所未有过的盛会，参加人数近3万人，除工人、学生踊跃参加外，有郊区农民6千人初次参加游行，民族工商业家也大部分在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发动下参加了这次大会，部分商店停业一天，参加游行”。军官教导团的学员也参加了游行，加入了捣毁日本洋行的行列，并一度冲击了在如安街大厅巷的日本驻昆领事馆。在昆明的省立第一中学率先成立了学生义勇军，发表宣言说：“势至今日，非血战不足以图存，非效死不可以苟生。同人等负籍滇垣，求学一堂，惧大难之来临，哀国亡之无日，同仇敌忾，志切请缨，爰组织青年义勇军，誓以铁血与虏相拼，以报复不共戴天之国仇，而挽回垂亡之国运”。呈贡县成立了“童子义勇军”，由团防局及私人借给五子枪10支、毛瑟枪35支、洋枪20支，认真训练。昆明县各区民众决定，凡18岁以上40岁以下，都参加义勇军，实施军事训练。东陆大学（云南大学的前身）亦组织了抗日救国义勇军“以为政府后盾”。到12月中旬，仅齐集于军官教导团的义勇军，即有“东大、一师、一中、一工、一农、六师、五中、职中、女中、法校、求中、无线电技术养成所、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省政府财政厅、教厅、建厅、农厅、禁烟局、市公安局、市教育局、省党部、市立第一、二、三、四、五、十五等校幼童等，共6千余人”。

工人、农民也积极行动起来，滇越铁路道区抗日救国总会于1931年11月22日成立于阿迷（今开远），各车站成立了分会，要求政府对日宣战“抵抗强权，救亡图存”。邮电工人于1932年2月25日成立了“云南邮工抗日救国五人团”，“以抗日救国为宗旨”。昆明市农会于1931年12月16日作出决定“组织义勇军，对日经济绝交，提倡国货，崇尚节俭，永不购买仇货，以贯彻抗日本旨”。

云南抗日爱国民众迅速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昆明市救国会发出通知：“关于本市仇货，除车站、邮局、交通要道，派员严密检查，并有各民众具结永不贩卖仇货外，本市内现存仇货，亟应定期限制，以绝根株。”对少数继续贩卖日货的商人，给以严厉的惩罚。据统计，云南的洋货进口，1932年为474万余金单位，比1931年的656.4万海关两，减少了100余万海关两之多。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同年底，日本对华贸易损失在1.5亿两之巨。云南昆明地区抵制日货运动，声势浩大，坚持较久，影响深远。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下，奋起抗击日军。昆明人民掀起了支援十九路军和上海受难同胞的热潮。1月30日，昆明市抗日救国会召开执委会，决定发动各界捐款慰问第十九路军官兵。华安机器厂的59名工人捐款4560元，并致电慰问；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每人捐款8元（2月份伙食津贴节余）；东陆大学募集捐款1.5万元；文明街回春堂药房袁氏三兄弟捐赠刀伤丹药1箱，价值1900余元。5月24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致电昆明抗日救国会，感谢昆明各界的支持。昆明各界人民还积极支持东北抗日军民，昆明市抗日救国会向马占山部捐款1000元，给东北难民救济会捐款4000元，昆明生生保育园学生捐款431元寄给马占山部。云南白药创始人、著名医生，云南东陆医院院长曲焕章致电中央和东北马占山，要捐赠白药“聊表区区之爱国愚忱，甚愿将士努力杀贼，复我疆土，是所至望！”

昆明各界青年还组成了“援沪敢死团”。1932年召开大会时，出席大会的敢死团团员达1700多人，又组成了“抗日铁血除奸团”，宣布“专司杀灭奸商及汉奸，与（对）倭奴作长期抵抗。”

1935年4月和1936年3至5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两次深入云南。红军在云南各地宣讲工农革命，宣传北上抗日。

使云南工农群众第一次知道了“工农革命”和“抗日救国”的道理；红军的斗争口号,如‘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等等。给云南人民极深的印象，许多口号标语，至今仍在云南一些地方隐约可见。红军长征过云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的影响，再次点燃了云南的革命火种。在中央红军长征过云南后，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于1935年11月又重建了在1930年被破坏的组织机构，成立了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其后又建立了中共昆明支部。

中共云南临时工委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秘密印发了党中央的《八一宣言》、《对时局的宣言》等，推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在中共地下党领导和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爱国青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中共云南临时工委根据党的抗日主张，积极推动云南各界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云南学生成立了爱国运动会，各校学生代表一致通过发表了《云南学生爱国运动宣言》和《告民众书》。1936年1月1日，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发动昆明大、中学生5000多人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张贴“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学生们的行动，“充满了热情和兴奋的活力，狂热的呼号和激动的血脉，并通过进行学生救亡组织的决定”。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发表的宣言中,要求政府‘一致合作对外!’告民众书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作下去，最后胜利都是属于我们的。”爱国运动会向政府请愿，提出六项要求：“一、请求政府保护中华民国行政领土之完整；二、请求政府取缔华北伪组织；三、请求政府公开外交；四、请求政府开放舆论，铲除汉奸；五、请求政府保护爱国运动并许可成立救国会；六、请求政府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昆明爱国学生还组成了一些秘密的读书会和爱国小团体，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1936 年 11 月，中共云南省临工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扩大抗日救亡组织，在学生爱国小团体基础上，“由李剑秋负责组成了‘云南省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并出版机关刊物《救亡》。12 月，秘密组成了‘云南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在昆明的学校、工厂和新闻、文化、妇女界发展会员、建立分会，团结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对云南的救亡运动有很大推动，云南新闻界进行了大量抗日救亡宣传。各报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集中全国军力、人力、财力，合力对外，一致拥护绥远的抗日军队，立刻武装民众，发动收复失地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样，中华民族达到复兴之路，才能解脱帝国主义的羁绊，也才能够生存在现世界上。”“中华民族今日唯一之出路，惟在不惜一切牺牲，以抵抗外敌之侵略……”西安事变后，“只要大家把国家的利益超呼个人的利益，把民族的利害超乎派别的利害，那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国家目前的基本政策，正如冯玉祥说：“第一个抗战，第二个抗战，第三个还是抗战。”

1937 年初，昆华师范学校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新文学研究会，出版油印的《新文学月刊》，宣传抗日救亡的新文化运动，并在工厂中发展会员，建立读书会组织。5 月，成立了“昆明学生救国联合会”（昆明学联），组织昆明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以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云南学生救国联合会’为基础，于 8 月 18 日成立了‘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简称学抗会），并在一些县建立了分会。学抗会在昆明和一些县份通过演讲、歌咏、演街头戏等形式，宣传全面抗战，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九·一八”二周年纪念日，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发动昆明市各界 3 万多人，以

学抗会为主，举行了纪念“九·一八”的游行和请愿。游行队伍高举大幅的国难地图，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各界同胞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恢复东北失地！拥护龙主席出兵抗日！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并演出《死亡线上》、《无名小卒》等话剧。第二天，学抗会所属各学校又组织歌咏、话剧团等到城郊农村进行宣传。

9月，各学校相继开学后，纷纷成立了抗敌后援会，社会各界还先后成立了妇女、女青年、小学生、文艺工作者等抗敌后援会，中央军校第五分校也成立了学生抗敌后援会。12月9日，学抗会组织“一二·九”学生运动两周年游行示威；12月25日，又组织了纪念护国起义示威大游行；学抗会高悬“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为前方抗日将士募捐公演”的红色大横牌，演出了以革命为题材的大型话剧《春风秋雨》。虽票价较高，但仍场场客满，演出收入全部献给前方抗日将士。学生抗敌后援会虽然只存在七个月，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

在学抗会成立的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李家鼎等人以昆明民众教育馆为活动场所，组织了“民众歌咏团”，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兴办歌咏干部训练班，许多学校、工厂、工会和县份都成立了歌咏队，使抗日救亡歌声遍及全省。1937年，民众歌咏团为纪念“九·一八”组织了万人大合唱。省学抗会停止活动后，以民众歌咏团为中心，组织了1938年“五九”国耻纪念大会、“七七”抗战周年大会、9月保卫武汉火炬大游行、12月反汪精卫示威火炬游行、1939年“九·一八”纪念的示威大游行等。

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为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决定将运动中涌现的骨干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党的一个秘密外围组织“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抗先”成立后，成为云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

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

了西南联合大学。联大学生中有 50 多人是‘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其中有的已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为“抗先”与“民先”能用共同的力量推动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决定将‘抗先’与‘民先’合并,组成“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部队”。后来，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在全国撤销了“民先”组织，云南执行了中央的决定，不过云南“民先”的骨干大多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主要有《火山》、《救亡》、《南方》、《前哨》、《战时知识》、《云南学生》、《民众歌咏》、《个旧曙光日报》等,纷纷出版，推动了云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先后疏散迁入云南的高等学校有：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大学、中正医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政治大学大理分校、北平中法大学、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唐山工学院、上海医学院等院校，云南大学也于 1938 年改为国立大学。大批学者、教授和文化界人士云集昆明等地，使昆明成为抗日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有力地推动了昆明等地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使昆明后来形成了“民主堡垒”。

1938 年 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成立(以后又称昆明分会),出版《文化岗位》(后更名《西南文艺》),发表有关抗日、民主的作品。云南的许多报纸，如《云南日报》、《正义报》、《昆明晚报》、《扫荡报》的副刊,均为分会成员担任编辑,同时还创办了《战歌》、《文学季刊》、《警钟》、《文学评论》、《匕首》、《十二月》等报刊。话剧和歌咏活动非常活跃,常有规模宏大的话剧和群众歌咏活动，曾演出《血洒卢沟桥》、《全民抗战》、《民族光荣》等戏剧。抗战期间在云南的文化团体，学术文艺刊物，都为抗日救亡而大声呐喊呼号，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档案史料记载，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直接参与和支持的抗日文化团体主要是文协、歌协。在党组织的影响下积极活动的救亡团体有：学生抗敌后援会、文抗会、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戏剧界抗敌协会等；文化团体有：文协分会、木刻协会分会、金马剧社、剧协、民众歌咏团、各报社、杂志社，以及中苏文化协会、中德文化协会等。《云南日报》本来是云南省政府的机关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不断刊登“新华社”消息，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还刊登毛泽东的著作《论新阶段》等。《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民主周刊》等报刊，也在云南公开发行。

总之，云南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人民群众中的抗日救亡气氛已经非常浓厚；抗战爆发后，云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始终推动着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向前发展。

## 三、在统一战线旗帜下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国共两党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实现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云南各民族人民的抗战，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

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于 1931 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1932 年初，又制造“一·二八”事变，全面进攻上海。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征服中华民族，霸占我国领土。在中华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一切政党和政治军事力量，理所当然地应毫不犹豫一致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和国家的危亡。但当时控制着南京中央政权的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竟采取不抵抗主义，置中华民族和国

家的生死存亡于不顾。

中国共产党鉴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我国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于9月21日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二八”事变后，又发出《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抗日武装联合起来，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在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呼吁和号召影响下，1933年11月发生了“福建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人，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宣布反蒋抗日，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各党派、各团体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因此“八一宣言”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拥护，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解决西安事变，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时局得到了根本性转机。

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

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作出了积极的有原则的让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确认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扩大民主和释放政治犯等原则，表示了抗战的意愿。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标志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慑于中国全民团结抗战局面开始形成，悍然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5日，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就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推动云南投入全民抗战，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巨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早在抗战之前即已开始。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过云南时，在上海的滇籍中共党员陈赓雅，以云南旅沪同乡会名义写信给龙云，提醒他警惕蒋介石乘机消灭异己，劝告他不要与过境红军为敌。1936年，红军二方面军长征进入云南，中共又托请贵州著名爱国人士周素园写信给龙云和滇军将领，希望他们给红军让路。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全面高涨。这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在云南就是更加注意做对龙云的争取和团结工作。1937年8月8日，龙云乘飞机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途经西安，龙云在西安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会面，并同机抵达南京。在南京，朱德、叶剑英和龙云就团结合作，共同抗日问题反复交换了意见，龙云受到极大的启发，热情地表示要派出20万兵力，支援全国抗战，还要派人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并要求和延安建立电讯联系。龙云由于

受到全国抗战高潮的推动和中共高层人士的启发鼓励，对参加抗战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和决心。他在南京对旅京云南同乡会的人们发表谈话说：他“代表云南 1300 万民众表达爱国护国之赤诚，愿将全部人力物力贡献中央，决心为国家民族神圣抗战奋斗到底。”中国共产党鉴于龙云愿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参加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和勇气，继续对他进行鼓励和支持。1938 年 8 月 21 日，朱德致函龙云说：“抗战军兴，滇省输送 20 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在将来抗战中，在争取最后（胜利）的搏斗中，云南将肩负更大责任，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1938 年，龙云电邀随红军长征到延安的周素园（时受聘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到昆明，聘为省政府咨议。中共中央委托周素园做龙云的工作，营救被关押在云南的一批共产党员出狱。在此期间，在《云南日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编发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大量文章，云南地方当局采取了默许态度。

1939 年 4 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为加强对云南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由马子卿担任省工委书记，原省工委书记李群杰不再任书记，专搞统战及情报工作。李群杰通过云南省政府秘书长袁不佑的关系，进入省政府当秘书，做龙云身边一些要员的工作，间接地向龙云宣传了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

1940 年日寇南进后，9 月 26、27 日，朱德、吴玉章又分别以师生、故交关系，写信给云南的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人士李根源，盛赞他的爱国热情，向他陈述中共对抗战的看法和主张，吁请他发挥影响，策动抗御日军南进。 11月，《新华日报》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李根源，龙、李都表示了要抗战到底的决心。

中共云南地下组织积极努力做争取、团结龙云的工作，国民党顽固派则一再竭力逼迫龙云反共。 1940 年 4 月，国民政府国